

# 挪威，走向当代



特隆赫姆市景

挪威人对音乐的爱好显而易见：人均拥有的音乐学校数量居世界前列；从南到北，音乐节星罗棋布，就连在北极圈里都有好几个音乐节。我也热衷去挪威，原因很简单：这个独立不到120年的国家在人文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很值得参考。

## 夺回对“当代”的阐释权

此次挪威之行的起点是奥斯陆Ultima当代音乐节(Ultimafestivalen)。全世界45名音乐专业人士受邀参加，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奥斯陆丰富的文化场景是音乐节的舞台：无论是开风气之先的挪威国家歌剧院，还是被评为“世界最佳图书馆”的戴希曼·比约维克(Deichman Bjørnvika)图书馆，乃至火车站、教堂、酒吧，都在上演各式各样的演出，民谣、摇滚、爵士……如恒河沙数。

最特别的一场演出在艺术家维格朗的墓穴中(Tomba Emmanuelle)举行。这也是奥斯陆各大音乐节最钟爱的场地。1942年，维格朗把他曾经的工作室窗户封死，变成陵墓，并用了数年时间创作了惊人的作品——名为《生命》的巨幅壁画，描绘了人类的本能，以及被阳光和地狱之火照亮的宇宙。人口很低，人们要低头才能走进毫不见光的陵墓。随着演出的进行，眼睛逐渐适应黑暗，才开始慢慢观察到壁画。壁画与演出往往形成互文。

Ultima的演出有一种统一的美学：音乐语言平实、易于理解。这引发了代表们的讨论：节目是否足够“当代”。什么是“当代”？在20世纪，以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严肃音乐界理所当然地定义了当代：“实验性”“打破疆界”。但大量作品过于先锋、过于理性、精于数学计算，并没有得到观众的喜欢，甚至引发了一种观众与作曲家之间的张力：观众指责作品“难听”或“怪异”，而作曲家则指责观众“无知”。“当代音乐”的意义不可低估、爱好者不少(可能以音乐界专业人士为主)，但绝大多数当代作品票房惨淡以致无法支撑



尼达罗斯大教堂内的管风琴

演出成本也是不争的事实。于是“青年作曲家计划”“当代音乐计划”等纷纷建立。资助对新方向的探索是绝对必要的，但在有一些国家也的确形成了一种孱弱的、自我欺骗的、远离观众的体系和产业。

在挪威这样只有550多万人口的国家，必须要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尽可能产生最大公共回报的地方，经费的使用效率总要经过充分讨论。Ultima的维度似乎大于音乐，更像是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历史、环保等各种话题都在这里上演。我参加的每一场演出都是观众爆满、气氛热烈。观众也各取所需：有些获得思考，也有些得到纯粹的消遣。一个以“当代”为名的艺术节能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它像万花筒一般呈现了当下的生活、当下正在发生的音乐。它呈现的“当代”是与群众依存的当代，而非精英主义的孤芳自赏。Ultima当代音乐节以其实际行动，争夺对“当代”的

阐述权。

在Ultima期间，我还观看了挪威国家歌剧院制作的斯特拉文斯基歌剧《浪子的历程》。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流畅、最完整的歌剧之一。导演马格努森的舞台呈现无疑是极为当代的，荒诞、滑稽、悲伤，一切都包裹在娱乐性中。扮演魔鬼的诺尔在舞台上挥洒自如，甚至跳起了韩国男团舞。如同这一“斯特拉文斯基向莫扎特致敬”的音乐，再次颠覆着传统，并开启了新的方向。

代表们体验了桑拿，这项活动在挪威极为流行。桑拿船坞位于奥斯陆峡湾中，与蒙克博物馆咫尺之遥。把身体蒸得足够热再跳入海中，水很冷、令人头脑清醒。若从5米高的屋顶跳，就更需要挑战自我。代表们在桑拿房里讨论关于当代音乐产业的各种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因为一切发生在挪威，自然而然与挪威有关。挪威人通过创造一个各国音乐人都能受益的公共设施，温柔地推广了挪威音乐家。

## 音乐是团结

特隆赫姆在奥斯陆以北约500公里，临海，是挪威第三大城市和教育中心。

特隆赫姆室内音乐节(Kamfest)1996年创立于一些咖啡厅中，至今规模仍然不大，但以创新和高质量的演出闻名。开幕式前的一场音乐会在城郊的一座农场中举行，音乐节艺术总监、小提琴演奏家维克带领小朋友们演奏了格里格、亨德尔以及民间歌曲。很多小朋友都是第一次登台，但他们很用心，可以看到极力追求完美。我羡慕他们的幸运，因为最好的音乐教育并非独自练习，而是与好的艺术家一起演奏，通过模仿、学习、感受而成长，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琴童并没有这种机会。年长者带领年幼者前行，如同人类千百年来生生不息那样，因爱传承、因爱胜利。这种氛围让人极为舒适。在农场的新鲜空气中，我更加期待之后的演出。

“家庭音乐会”系列延续了这种温暖。每年都有一场竞赛(投标)，获胜的家庭可以将音乐家们邀请到家里演奏，并款待观众们。室内乐从音乐厅回到室内。今年的获胜者是挪威科技大学的3D打印教授索尔比一家，他们能够演奏多种乐器，孩子们在教堂合唱团唱了十几年。他告诉我们，音乐早已融入房子的墙壁中：这幢房子的前主人是奥普达尔夫妇。奥普达尔是特隆赫姆市政音乐学校1973年开学时的第一任校长。

开幕式演出情感浓烈，由色彩游戏(Fargespill)歌舞团与特隆赫姆交响乐团和歌剧院(Trondheim Symfoniorkester & Opera)共同演出。色彩游戏的成员是常住特隆赫姆的、来自40多个国家的70多名儿童和少年，他们演出的节目以世界各国的音乐舞蹈为基础，欢快、热烈，没有半点煽情的意图，但我和

一位常住德国的女高音从头哭到尾。孩子们在一起学习对方的文化，体会到彼此的不同，从互相理解，到充满自尊、自信地共存，色彩游戏展现了艺术如何超越现实。当我们目睹现实难以想象的残酷，再看到现实难以想象的美好，很难不动容。

我特意约见了色彩游戏的负责人。她告诉我特隆赫姆的色彩游戏已经持续13年了。孩子们来自各个学校，每周排练1个小时，有时2个小时。很多孩子们从未学过音乐和舞蹈，开幕式中近一半的孩子也是第一次表演。所有演出的内容来自孩子自己。采用这种创作和教学方法的原因是：老师们观察到新移民和难民的孩子由于一开始不掌握当地语言，就会被认为不够聪明；但是色彩游戏通过让孩子们带来自己文化的歌曲，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表演，这让他们自豪。所以色彩游戏的基调不仅是孩子们的可爱，也不是观众为这些孩子难过，而是为他们感到骄傲。

## 告别尼达罗斯

音乐节中另一场有意思的音乐会是尼达罗斯大教堂中的管风琴和合唱音乐会。大教堂中的三座管风琴同时演奏，与童声合唱一起创造了辉煌的效果。1930年的斯坦迈尔(Steinmeyer)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教堂管风琴之一，1741年的巴洛克风格由德国管风琴制作师瓦格纳(Joachim Wagner)制作，是罕见的保存完好的大型巴洛克风格管风琴。

特隆赫姆直到1217年都是挪威的首都。它的旧称是尼达罗斯，这也是尼达罗斯教堂得名的原因。这座教堂是世界最北的哥特式中世纪大教堂，也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大教堂，历史上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教堂旁的大主教官殿(Erkebispegarden)存有挪威王冠。可以说尼达罗斯在挪威的历史和宗教方面，都极为重要。

经过多年的变迁，尼达罗斯已变成特隆赫姆。20世纪上半叶，挪威民族主义盛行，政府决定于1930年把名字改回尼达罗斯，结果在全民公投中，90%人反对。政府与民众反复拉扯，最终导致民众大规模抵制和抗议。当地人认为：虽然尼达罗斯有历史意义，但特隆赫姆的历史并不局限于此。特隆赫姆这个名字已被使用了几个世纪，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承载了家庭、社区的记忆，所以市民对“特隆赫姆”之名有着强烈的情感归属感。回归旧名是一种不必要的“历史复兴主义”，强行将过去的名字套用于现代社会显得不自然，更有记忆被抹去之感。同时，回归旧名也可能被视为“倒退”，让人觉得总是回望过去，而现代的成就、进步和认同被忽视。所以，特隆赫姆才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形象和向往。



艺术总监与孩子们一起拉琴 Ole Wuttudal摄(艺术节提供)